

艾森豪威尔处理苏伊士运河战争危机的 经验及其对奥巴马政府的启示

于英红

内容提要 1956年10月,以色列在美国总统大选前8天,不顾艾森豪威尔政府预先劝诫,在英、法两国幕后策划下,对埃及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艾森豪威尔总统为此采取一系列行动,如诉诸联合国、启动对以经济制裁、甚至威胁驱逐其出联合国,最终实现被他称之为“侵略者”的三方无条件停火撤退。艾森豪威尔成功的范例给2012年面临同样难题的奥巴马提供了一些历史经验:美国的外交不能被一个小盟国所捆绑,即便他们曾是美国的“铁杆”朋友。美国只有坚持公正、理性与原则,且在冲突中支持受害者,才能最大程度上维护美国的利益与形象,并最终使美国成为中东最具有决定性的外部力量。

关键词 美以关系 苏伊士运河危机 艾森豪威尔 奥巴马

作者简介 于英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25)。

1956年10月,在距美国总统大选数日之前,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冒着输掉总统连任机会的风险,通过多种渠道对以色列强力施压,最终迫使其停战撤退。56年后,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 Obama)再次面临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伊朗的可能,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外交政策以及影响美国采取这一政策的因素,进而分析艾森豪威尔处理中东危机的经验,以及可能对奥巴马政府的启示。

艾森豪威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外交决策

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直接起因是 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宣布将运河国有化，理由是美、英两国拒绝对阿斯旺水坝进行财政援助，他要通过积累运河盈利为修坝筹款^①。这一行动引起英、法的激烈反应，英国主流媒体《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甚至把纳赛尔比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呼吁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回击。法国外长皮诺（Christian Pineau）将纳赛尔的行动比作希特勒获取莱茵兰，认为必须以武力快速回应，否则欧洲只能仰仗阿拉伯人的善意度日。为此，英、法两国计划联合行动夺回运河。

英、法两国希望美国也加入行动。当时英国是运河的最大使用国，美国居其次。艾森豪威尔则认为采取军事行动会触怒世界舆论，应该由全体航运国家共同承担责任。从当年 7 月底到 8 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努力寻求国际解决方式，并劝阻英、法诉诸武力。7 月 31 日，英国通过外交照会告知美国：它们已经做出粉碎纳赛尔做法的决定。艾森豪威尔派国务卿杜勒斯（Foster Dulles）携亲笔信赴伦敦，向英国首相艾登阐明这一决定是错误的。

法国在运河国有化后马上向以色列额外运送了 24 架战斗机，而艾森豪威尔提请法国不要把纳赛尔的行动与阿以宿怨关联起来。8 月，约旦、以色列边境发生冲突。随后两个月里，约以边境军事形势恶化，约旦国内局势不稳，这给以色列提供了掩饰其攻打埃及计划的机会。美国当时怀疑以色列会趁约旦内乱夺取领土，警告其不要采取对和平不利的行动。10 月 25 日，约旦、埃及、叙利亚签署《安曼条约》，结成共同防御联盟，条约规定在与以色列发生战争时，三国军队由一个埃及总司令统一指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Da-

^① 美国认为这一理由是不成立的，按照估算修建水坝大概需要 13 亿美元，而运河每年纯盈利 3 000 万美元，仅靠运河利润，埃及需要大约 43 年时间。而且此前谈判一直不顺利，美国国会中反对援助埃及修水坝的声音一直非常强烈，亲以色列的院外游说集团一直致力于向白宫和国会施压反对援助埃及，来自南方产棉州的议员唯恐给同为产棉国的埃及提供援助从而增强了其在国际纺织品市场的竞争力，许多议员认为纳赛尔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之时宣布实行“肯定性中立”政策实际上是想把苏联引入中东。而在谈判中，埃及方面也多次提及如果美国不提供援助，他们会向苏联方面争取。这种激将法起到了反作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将美国最终决定告知埃及驻美大使侯赛因时明确告知，美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敲诈。因此艾森豪威尔认为埃及对最终结果应该有心理准备，不至于有收回运河这一剧烈反应。

vid Ben - Gurion) 认为, 该条约将以色列置于危险境地, 以军方计划出其不意打击埃及, 速战速决。当美国驻约旦大使在全力关注约旦和以色列局势时, 以色列对埃及的军事打击却已箭在弦上。10月29日, 以色列部队兵分五路进攻埃及, 一夜之间进入埃及75英里, 到达距离苏伊士运河仅25英里处。

以色列先发制人行动让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愤怒。美国与三国是盟友, 若就个人关系而言, 他与英、法政府首脑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军协同作战中结下深厚的个人友谊, 但在他弄清其英、法盟友与以色列站在同一立场上后, 遂选择了与朋友、盟友对立的道路。29日, 他在迈阿密机场宣布美国将尽全力阻止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 并在当日赶回华盛顿, 指示国务卿杜勒斯召见英、法两国驻美大使馆官员, 询问他们是否预先知道此事, 并希望他们愿意和美国一起争取让联合国制止以色列。杜勒斯认为, “他们躲躲闪闪的态度和不知情的回答无异于表明内心有愧^①”。当晚, 他在白宫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强调, “以色列开战是为了扩大领土, 但是要生存, 他们需要与阿拉伯国家维持和平^②。”会后, 艾森豪威尔让杜勒斯致电本·古里安 “福斯特(杜勒斯), 你告诉他们: 上帝诅咒此事, 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制裁, 我们要去联合国, 我们会做一切能做的事制止他们”^③。

继而, 情报显示英、法两国部队正在向塞浦路斯方向集结, 艾森豪威尔旋即指示杜勒斯, “马上让英国人知道我们的立场, 如果英国人支持以色列, 他们会发现我们支持埃及”。英国使馆代办库尔逊(John Coulson)被叫到白宫, 艾森豪威尔再次向他询问英国是否愿意与美国一道支持埃及事宜。库尔逊则欲借机打探美国是否拟将此事诉诸联合国安理会。对此,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 “我们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联合国, 一定要在苏联人到那之前赶到”^④。30日, 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项决议草案, 呼吁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一致反对在中东使用武力, 英、法两国投了否决票, 导致这项草案未获通过。当日, 英、法两国在伦敦磋商后向埃、以发出最后通牒: 限令埃及

① Kelth Kyle, *Suez: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LB. Tauris and Co Ltd, 2011, p. 345.

② Isaac Alteras, *Eisenhower and Israel: U. S. - Israeli Relations, 1953 - 1960*,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3, p. 224.

③ David Tal ed., *The 1956 War: Collusion and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 27.

④ Isaac Alteras, op. cit., p. 225.

和以色列军队撤退到距离苏伊士运河 10 英里处，以便于航运国家船只通过。为维持秩序，英、法军队进入运河区的塞得港、伊士梅利亚和苏伊士等关键地点，并要求双方在 12 小时内做出答复并按照要求撤退，否则英、法军队将介入强制执行。按照事先约定，以色列接受通牒并撤退至离运河 10 英里处，但此时以色列军队仍插入埃及 100 多英里。至此，艾森豪威尔在失望中彻底明白英、法、以三国共同打击埃及之目的。不过，国务卿杜勒斯却认为，英、法两国的态度让美国更为轻松，因为近两三年来他一直担心“美国和执行殖民主义外交的两个国家保持一致，与美国政策不符”^①。11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议案，要求立即停火撤退。美国在同一天宣布对以色列进行经济制裁。第二天，联合国大会以 64 对 5 票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停火议案。以色列则报告他们已攻下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

英国也拒绝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艾登表示，如果现在撤军，英国在中东的一切利益将付之一炬。11 月 4 日，英国国内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众游行，要求艾登辞职。5 日，英、法伞兵降落在塞得港以西、以南地区。苏联外长布尔加宁警告英、法两国，苏联正在考虑使用火箭弹打击英法的可能性。美国当天随即向苏联发出警告：在联合国停火决议生效后，任何出现在埃及的新部队都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之行为，届时美国将会采取一切行动予以反击。6 日，英、法两国下令停火，但希望美国能够参加联合国警察部队，进驻埃及。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希望任何大国都不要参加这个部队，应完全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处理，因为他认为任何大国派遣军队，都会招致苏联派遣一支更大规模的部队进入该地。7 日，以色列拒绝接受停火决议，表示要撤出已经占据且一直向往的土地是困难的。艾森豪威尔告诉本·古里安：联合国部队正在前往埃及的路上，以色列不履行决议是在与联合国作战。同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胡佛（Herbert Charles Hoover）致电以色列外长，表示美国考虑在联合国发起制裁以色列经济和将以色列驱逐出联合国的倡议。^② 本·古里安对此回应称，他愿意与艾森豪威尔私下会晤，而美国认为这种会晤只能在以军全部撤离埃及之后才会予以考虑。

11 月 8 日，以色列内阁经过 9 小时会议磋商之后才同意撤退。以色列大

^① Steven L. Spiegel, *The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71.

^② Henry Cattan, *The Palestine Question*, Croom Helm Ltd, 1988, p. 95.

使在转交本·古里安给艾森豪威尔的亲笔信中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吞并西奈半岛，由于联合国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并使国际部队进入苏伊士运河区，以色列同意撤军。”^①但是，以色列只是撤离西奈地区，声称要守住亚喀巴湾和加沙，直到运河自由通航兑现并要求确保其使用运河的权利。随后4个月里，艾森豪威尔政府、联合国与以色列展开外交拉锯战，在联合国，美国大使洛奇和联合国秘书长一道坚决反对以色列对撤兵提出任何前置条件。

1957年2月，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对以色列进行制裁的动议在美国国会遭遇抵制，但他并未因此停止对以色列施压。他致电本·古里安，表示美国会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包括所有来自政府和私人的援助。^②2月20日，艾森豪威尔通过电视讲话向以色列传递更为强硬的信号，“一个未得到联合国许可就攻击并占领他国领土的国家是无权对撤退提出任何前提条件的”。^③

3月初，本·古里安仍希望争取美国确认其使用国际水道权利的书面保证，杜勒斯向以色列大使表示，以色列继续滞留将会给埃及提供口实，美国所能做到的只是希望埃及不要再次采取行动。以色列大使致信本·古里安表示，杜勒斯的口头保证是以色列从美国争取到利益的最大值。面对这些压力，以色列不得不在3月4日告知联合国大会其撤退的最终决定。以色列在拖延3个多月后，最终于3月12日无条件从加沙全部撤退。

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决策的因素

应该说，在美国总统大选前8天里，艾森豪威尔向以色列施压，是冒很大内政、外交风险的，在国内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可能会损失犹太选民的支持而输掉连任机会，在国外则有可能伤及与盟友之间的友谊。但在其他一系列重要因素的影响下，艾森豪威尔坚定了反对使用武力的立场。

第一，艾森豪威尔认为，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缺乏正当理由。危机发生之初，艾森豪威尔就明确表示，反对英、法两国使用武力夺取运河，同

① Henry Cattan, *The Palestine Question*, Croom Helm Ltd, 1988, p. 95.

② Isaac Alteras, op. cit., p. 271.

③ Seymour Maxwell Finger, *Inside the World of Diplomacy: the U. S. Foreign Service in a Changing World*,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p. 40.

时告诫英、法政府：武力解决缺乏合理依据，会招致世界舆论谴责。他还提请英、法两国注意：在二战后去殖民化时代，武力已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艾森豪威尔认为，无论就军事实力还是经济能力而言，英、法两国都已无力继续控制中东，美国不可避免地将在这一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他不想与英、法的殖民主义方式连接在一起，避免损害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威信。此外，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的国际水道，从国家主权角度，只要不妨碍航行自由和引航安全，埃及总统纳赛尔就有理由接管它。而纳赛尔驱逐英国领航员后，埃及领航员成功带船通过，说明英、法两国认为埃及技术不够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被盟友欺骗刺激了美国政府。以色列对美国采取的声东击西策略奏效了。美国在此之前一直担心以色列会进攻约旦，他告诉杜勒斯，“本·古里安是想趁着西方国家忙于应付纳赛尔时，借助约旦和以色列边境恶化的局势占领约旦河西岸土地”^①。他指示杜勒斯告诉以色列大使，美国反对针对约旦的任何军事行动，还警告说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会招致联合国决议，使以色列陷于外交孤立。^② 在开战前 10 天里，美国的 3 个友邦对美国隐瞒了信息。10 月 11 日，英国首相艾登召回了英国驻美大使，直到 11 月 8 日之前英国大使都不在华盛顿。10 月 14 日，艾登会晤了刚从以色列回来的法国高层军事代表团，得知法国和以色列制定的打击埃及的秘密计划后，决定加入该计划。此后，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越洋通讯急剧减少。开战前一天，美国发现以色列在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通讯侦察也显示近日来以色列和法国之间的外交无线电空前增加。以色列驻美大使表示，这只是常规性防御措施，法国大使则称不清楚无线电中所言内容。而美国中情局通过高空侦察发现，以色列境内有 60 架法国神秘战斗机，而非法国事前通知美国运送的 24 架战机。以色列、英国和法国等盟友的协同行动激怒了艾森豪威尔。

第三，以、英、法三国违反了三方盟约，损害了美国威信。1950 年 5 月 26 日，英、美、法三国签署了《三方宣言》(Tri-Partite Declaration)，按照这一宣言，三方承诺不向中东任何国家大规模出售武器，必要时三国在联合国内外采取一致行动，挫败任何僭越 1949 年休战线的军事行动。此后，英国

^① Isaac Alteras, op. cit., p. 215.

^② Cole Christian Kingseed, op. cit., p. 83.

作为中东武器的主要供应者，按照宣言规定的平衡原则向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有限度地出售武器。1956年初，为维持平衡，美国先后拒绝了埃、以两国提出的购买武器申请。战争开始后，美国希望英、法和美国一道履行《三方宣言》的责任义务，但被盟友告知《三方宣言》已经失效，希望艾森豪威尔能够以他的威望支持这一行动。艾森豪威尔则签署一项声明，表示“本届政府矢志于支持遭受侵略的受害者，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诺言”，“我们必须说话算数，如果英国干预，它将在英美两国之间制造裂痕”。^①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英、法两国在以色列进攻埃及后的支持态度、军事集结以及最终向埃及投送兵力的行动，违反了三方盟约，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威信。

第四，艾森豪威尔无法容忍以色列军事行动与美国大选的关联与投机。艾森豪威尔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国大选前一周行动，想借助美国犹太人的游说努力和选举效应劫持美国外交政策，试图使之为了获得选票而不得不默认或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非常恼火，他抱怨，“我们似乎遇到了麻烦，如果以色列继续打下去，我不得不用武力制止他们。如果这样做，我就会输掉这次大选，至少会输掉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州”。^②在给一位少年时代好友的信中，艾森豪威尔再次陈述了他对以色列军事行动与美国国内政治之间关联的看法，“本届政府已经意识到本·古里安试图利用美国大选前这段时间发动战争，因为过去很多政治家都非常重视犹太人选票的重要性。我已经给国务院下达严格命令，让他们通知以色列：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立场行事，权当美国根本没有一位犹太人。”^③他还指示杜勒斯通知本·古里安，“不要以为我们会把赢得大选看得和维护和平同等重要”。^④

本·古里安是否真的有这重考量？在他的日记和以色列官方文件中，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本·古里安确实反对在这一时间点行动，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呼吁和平的参选人，他不会支持一场在中东进行的战争，无论发动者是其盟友，还是朋友。他曾和这场战争的计划制定方——

^① David Allen Nichols, *Eisenhower 1956: the President's Year of Crisis: Suez and the Brink of War*,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p. 205.

^② Isaac Alteras, op. cit., p. 226.

^③ Ibid.

^④ Isaac Alteras, op. cit., p. 215.

法国商量，待美国大选结束后再进攻埃及，但是法国认为二者联系不大，以色列军方认为出其不意和速度是此次军事行动取胜的关键，不宜拖延。

尽管如此，在战争前后，以色列确实借助犹太裔对选举政治的影响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自1868年格兰特将军参选总统时犹太人选票成为选举政治一大议题后，^① 犹太人选票成为美国选举的一个重要参数，以色列深知这一点。在军事行动之前，犹太团体在纽约和其他犹太人聚居的大城市大量散发宣传册，“投票给艾克就是支持纳赛尔”。^② 不过，这种宣传对改变艾森豪威尔的立场未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国会议员产生的效应却是显著的。亲以色列的美国国会议员在参议院民主党多数派领袖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的率领下抨击政府的立场。其结果是：当白宫设法启动制裁以色列逼迫其遵守联合国停火决议时，遇到了国会议员的强力阻拦。但艾森豪威尔没有放弃，转而诉诸联合国制裁等方式坚持自己的立场。

最后，艾森豪威尔还认为，以色列打击埃及令美国难堪、苏联得利。1956年10月20日，波兰共产党反抗苏共，22日匈牙利爆发革命，要求撤退苏联军队，25日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苏联以武力应对东欧卫星国的自由要求，让总统大选前的艾森豪威尔看到了对苏联进行负面宣传的一次极佳机会。他原本想借机说明小国一旦落入苏联控制会是何种后果，他认为这对中东那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很有启示意义。于是，在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说，“我对那些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国家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他们见证了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之后还想和苏联打交道。正因为此，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匈牙利局势让世界清醒过来”。^③ 而以色列进攻埃及分散了世界对苏联打压行动的关注，让美国不能对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做出积极回应。艾森豪威尔任内的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后来解释说，“我们不能一边抨击苏联干预匈牙利，一边支持英法干预纳赛尔”。^④ 而且，进攻埃及不但鼓励

①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首领格兰特将军曾经下令将犹太人从肯塔基和密西西比地区驱逐出去，1868年成为竞争对手抨击的目标之一。

② Henry Cattin, op. cit., p. 95.

③ Rose McDermott, *Risk 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 144.

④ László Borhi, *Hungary in the Cold War, 1945 - 1956: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01.

了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还可能给苏联提供进入中东的机会。^①事态发展也证实了这一担忧。苏联在消弭匈牙利的反抗之后，马上把注意力转向中东。这些忧虑促使艾森豪威尔坚决地反对以、英、法三国对埃及的军事行动。

对奥巴马政府处理以伊危机的启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56年10月艾森豪威尔面临的危机在2012年摆在了奥巴马面前：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伊朗核危机加剧，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美国外交面临着被以色列捆绑的危险。但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动，两届政府面临的危机也有相同与不同之处。在新形势下，奥巴马如何借鉴艾森豪威尔的危机处理经验化解难题，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国际环境方面，两届政府都面临着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不过其实际内容有所差别。1956年正是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国在全球范围内争相扩大影响力，因为能源和国际水道的战略地位，中东成为美、苏激烈争夺之地。在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在外交决策中有一项重要考量，就是要尽最大努力避免给苏联进入中东地区制造机会。而奥巴马政府所处的外部环境中，冷战威胁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恐怖主义和能源危机的威胁。伊朗核设施不但在以色列看来威胁其生存，对美国而言也可能危及其反对核扩散的战略目标。

在国内环境方面，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奥巴马面临更大的选举压力。1956年，美国经济运行良好，艾森豪威尔的声望是其他总统参选人无法企及的。而奥巴马自2008年执政以来一直受到经济危机困扰，他力倡的医保改革也屡遭诟病。在总统选战中，奥巴马正遭受亲以力量和犹太裔院外游说的压力，还在初选中的共和党候选人都争先恐后把奥巴马描绘成一个对以色列不太忠诚、对伊朗过度容忍的形象。不过，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手中握有可以回应犹太选民指责的挡箭牌。当2011年8月巴勒斯坦单方面把立国问题议案提交给联合国时，美国在安理会投了否决票。而且，过去几个月来，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已经加深了伊朗的经济、外交孤立。美国官员表示，政府

^① Spencer Tucker, Priscilla Mary,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ABC - CLIO. Inc, 2008, p. 314.

只是需要时间来做伊朗的工作，而不是在疏以亲伊。而且，在奥巴马政府任内，美国击毙了本·拉登，在反恐方面的进展使奥巴马在主张武力解决的声音面前有了底气。因此，奥巴马基本上具备了吸收艾森豪威尔在危机中外交决策经验的主、客观条件，从而为奥巴马政府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预留了外交空间。

对于伊朗核问题，奥巴马政府认为：武力只能暂时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经济制裁与接触并进”的双轨政策与伊朗斡旋。此外，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行为的容忍底线也存在差异，以色列将伊朗拥有发展核能力及发展到免疫区（Immunity Zone）之前定为红线，^①美国则以实际生产出核武器为界限，美国官员认为“美国仍然有很多年时间劝阻伊朗研制核武器”。^②

基于上述认知，奥巴马沿袭了类似于艾森豪威尔政府 1956 年的反危机思路，以应对不断发酵的伊朗核危机，力劝以色列不要诉诸武力。为了劝阻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伊朗，2012 年 2 月以来，奥巴马政府派出了一系列高层使团前往以色列，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邓普西（Martin E. Dempsey）、国家安全顾问唐尼龙（Thomas E. Donilon）和由智库成员、参议员和政府高官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向以色列方面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不要攻打伊朗。邓普西甚至在访问以色列后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把伊朗描述成一个“理性的角色”。^③3 月 5 日，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华盛顿进行首脑会晤，再次力劝以色列不要诉诸武力，并考虑援助以色列巨型钻地导弹、空中加油机等尖端武器以延迟以色列单方面进攻伊朗。尽管如此，内塔尼亚胡依然对美国明确表示，“如果他们决定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将不会通知美国”。^④他抱怨说，“美国高层官员认为问题出在以色列而非伊朗身上”。^⑤

虽然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及私下交易，但以色列总理的表态说明奥巴马仍有可能会面临艾森豪威尔在 1956 年遇到的情况：以色列因为预先知道美

① 以色列提到的免疫区是指伊朗核力量已经发展到超越以色列空中力量打击范围。

② Carol E. Lee, Jay Solomon, “U. S. Considers New Message on Ir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8, 2012.

③ “Iran is a Rational Actor, Top U. S. General Tells CNN”, *Tehran Times*, February 19, 2012.

④ “Israel could Strike Iran without Warning U. S.”, *CBS News*, February 27, 2012.

⑤ Carol E. Lee, Jay Solomon. op. cit.

国对军事行动的态度，为了避免受到美国劝阻，刻意避开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但问题是，以色列进攻伊朗和1956年攻打埃及存在客观因素上的很大差别，以色列和埃及两国是邻国，以色列具有发动快速袭击的优势，但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隔着约旦，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伊朗的潜在友国，要穿越这些国家的上空去攻打伊朗恐非易事。这就对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命题：以色列若攻击伊朗是否会引发中东连锁反应？到时美国将陷于更加艰难的境地。

面对以色列对伊朗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奥巴马该如何实现大选与外交间平衡？美国与以色列有共同利益——维护苏伊士运河通行自由与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美、以在解决方式上又存在很大分歧。事实证明，艾森豪威尔1956年10月的危机处理成功地实现了多赢：他不但以压倒性胜利赢得了总统大选，维护国际法的做法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声望，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在随后得到了修补，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能力。这为奥巴马提供了很好的危机处理范例。

反对以色列，包括反对二战中的盟友——英、法，并没有让艾森豪威尔输掉大选。艾森豪威尔成功指挥北非作战和诺曼底登陆的反法西斯战争英雄形象，帮助他分享到了民主党人的犹太选票。艾森豪威尔在获得犹太人选票上是1920年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之后表现最好的共和党参选人。^① 理性、讲究原则、反对侵略的立场和危机处理方式使艾森豪威尔的国际声望得到空前提高。

艾森豪威尔的强力阻止，避免了美国外交被一个盟国捆绑，也避免苏伊士运河危机扩大成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此次危机之后，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实行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强化了1950年《三方宣言》中支持受害者的立场。正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理性与远见，美国成功阻止了苏联在中东地区影响的扩大，也成功地分化了中东国家，为美国在中东赢得了一批关键盟友——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从而让美国自此逐步取代前殖民大国与世界霸主——英国在中东的地位，且日益成为对中东最具有决定性的外部力量。

^① 1920年，哈定赢得43%的犹太选票。

Lessons of Eisenhower's Response to The Suez War and Its Inspirations to Obama Administration

Yu Yinghong

Abstract: Regardless of the exhortation of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in advance, Israel formulated a secret plan with Britain and France, and took a pre-emptive military strike on Egypt in October 1956, just eight days before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order to stop Israel, Britain and France, President Eisenhower made a range of efforts, which included presenting a cease-fire resolution to the UN against Israel, proposing the U. S. Congress to agree with launching economic sanctions, and even threatening to have Israel expell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ll these strong pressures finally forced the three parties, which he called aggressors, to cease fire and retreat unconditionally. The experience of Eisenhower's wise response to the Suez Crisis might provide historical lessons for President Obama: U. S. foreign policy could not be bound by a small country's plan, even though this country is a fri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 should pursue the just, rational stance of obeying the rules and supporting the victims in a conflict. Through these ways, the state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prestig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e maintained to a great extent. Since then, America gradually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ce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U. S. - Israel Relations; The Suez Crisis; Dwight D. Eisenhower; Barack H. Obama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